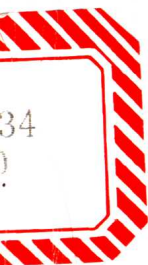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诗学

主编 陆耀东
著 於可训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诗学

主编 陆耀东
著 於可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诗学/於可顺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11

(中国诗学丛书/陆耀东主编)

ISBN 7-5438-2524-4

I. 当... II. 於... III. 当代文学-诗歌-文学
理论-中国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124 号

责任编辑: 曹有鹏 许久文

张志红 吴文娟

封面篆刻: 弘 征

装帧设计: 陈 新

当代诗学

於可顺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92,000

ISBN 7-5438-2524-4

I·313 定价:14.50 元



中国诗学丛书

- | | |
|---------|---------|
| 先秦两汉诗学 | 孙家富 |
| 魏晋南北朝诗学 | 陈贻智 |
| 唐代诗学 | 乔惟德 尚永亮 |
| 宋代诗学 | 张思齐 |
| 明代诗学 | 陈文新 |
| 清代诗学 | 李世英 陈水云 |
| 近代诗学 | 程亚林 |
| 现代诗学 | 龙泉明 邹建军 |
| 当代诗学 | 於可训 |



总序

总序

这套《中国诗学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诗学概念,系取狭义。不过,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先秦乃至魏晋,往往是将诗与文(而且是广义的“文”,含历史、哲学、文学等)混合在一起谈论,故我们在解读古代诗学时,又不能不逾越狭义诗学的范畴。《丛书》的内容,涵盖中国古代诗词的理论、批评、鉴赏和 20 世纪的新诗诗学。它共分九卷,基本以朝代为序分卷,兼顾中国诗学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先秦两汉广义的诗学为第一卷;魏晋南北朝诗学,为第二卷;唐代诗学,为第三卷;宋代诗学,列为第四卷;明代诗学,为第五卷;清代诗学,为第六卷,但将晚清(以 1840 年为标志)划出与民国初年诗学(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合为近代诗学,为第七卷;从五四前夕至 40 年代末,为现代诗学,列为第八卷;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为当代诗学,列为第九卷。这种划分,我们虽然可以申述各种理由,但毋庸讳言,它也和其他分期方式一样,^①存在诸多困难与局限。

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如何估计和评价,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说:它零星的感悟多,鉴赏性的随感多,即使精

① 如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以诗学的发展线索为分期根据

彩,也不过是吉光片羽,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云:它比西方的诗学更精彩,表面上看,它大多没有表述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在颗颗珍珠般的见解后面,有其内在联系和体系在。但不管是前者抑或后者,谁都不否认,中国诗学是一个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世界,是一个闪耀着无尽光辉的星海。是的,它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数以万计诗论家和诗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心血。有些诗学问题,从最初不免于粗泛的涉及或提出,到后来论述趋于周密精深,历经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之久。其间有冷静的学理探讨,有持不同观点的杂含意气的攻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深度的层层递进,也有前进途中的迂回曲折;有的是诗学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有的是理论转型期的过渡性成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温柔敦厚”和“思无邪”观念,显然意在以其规范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但其影响历时两千多年而不绝,值得深究。《文心雕龙》如书名所示,并非诗学专论,但含诗学在内,其精妙与文采,亘古未有,即使置于当时的世界诗学中,它也是罕见的经典性论著。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诗话”、“词话”大量出现,其中如《白石诗说》、《沧浪诗话》、《渔洋诗话》、《随园诗话》、《人间词话》等,虽并非均系原创性诗学,但都有各具特色的诗学理论做支撑,有的形体就具有系统性,有的则须由研究者加以梳理。以《沧浪诗话》为例,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诗辨”近似总论;“诗体”着重于论诗的体式;“诗法”总结诗的若干技巧问题;“诗评”主要为对诗人诗作的评论兼及批评方法及标准;“考证”有关于诗人事迹的追寻,有对作者、版本和诗篇、诗句的索隐和考证。对诗歌艺术的论述,相当系统。《沧浪诗话》有一段名言: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

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①

这是《沧浪诗话》的理论核心。严羽的诗论,虽不免有以禅喻诗的痕迹,然而由于他对诗的内在特性有深刻理解,因而精辟之见多多。

如所周知,中国诗学在先秦阶段尚处在胎萌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诗学,开始形成不同理论架构的雏形。魏晋、唐宋、明清是中国诗学的三个高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学的形成期,情思和格律的构建吸取了西域文化的异质影响,诗学从文、史、哲中走向独立,诗的格律理论趋向成熟。这一切,为唐诗高峰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准备了条件。唐宋不仅是我国诗词群山里顶峰中的顶峰,诗学也有很大发展,几乎论及中国诗学的所有问题,如“用事”、“自然”、“妙悟”、“神思”、“意境”、“形神”、“寄托”、情与景、诗与理、含蓄与直露、诗味、诗法、炼意、诗眼、比兴、声韵、风格、诗体等等诗学内部问题,无不涉及。意境说在王昌龄的《诗格》^②中正式提出后,影响深远。20世纪初美英流行的意象派诗的产生,即受唐诗流泽,不少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是诗人受中国古诗启迪而创作的。^③关于诗与理、诗与禅的关系的理论探讨,在宋代臻于极致。明清两代诗学论著繁富,其中不乏创见和新意,但大多系整合式成果。晚清民初,中国诗学从古典型向现代型过渡,外国诗学开始影响中国诗学,王国维是一代表。^④20世纪新诗诞生后,一些诗家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理论体系,胡适、闻一多、戴望舒、梁宗岱、朱自清、朱光潜、艾青、胡风、何其芳、袁可嘉等均做了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未能

总序

① 《沧浪诗话·诗辨五》。

② 《诗格》,王昌龄作,有人认为系后人所撰,姑存疑。有关“意境”一段原文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景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③ 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参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完成中国诗学的转型和重构。这,惟有待于 21 世纪了。应该说明:20 世纪中国学者对传统诗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史料的校勘、辑录、出版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在论著方面,从王国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以世界现代诗学观念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左”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和简单化,严重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进展。

《丛书》的主要依据为中国诗学理论批评文字,时或注意从诗词创作中总结出诗学理论,或联系诗词创作中的典型现象,或注意当时流行的欣赏习惯和鉴赏标准。在当时高层次诗人、学者所持的观念与一般读者中流行的审美观念之间,我们或重前者,或取兼顾。

《丛书》的总体设计工作由我承担。我的设想是:不着意于将它写成中国诗学史,尽管每一个卷也有对特定时段内诗学发展概况的勾勒,全景的鸟瞰,上承和下传,但限定所占篇幅不得超过该卷的四分之一;同时要求各位著作者致力于此时段内主要诗学理论问题的深入细致的探讨,阐明其对中国诗学的新贡献,尽可能地顾及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中国诗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求每一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获。

《丛书》企图贯彻“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比较准确地阐明各个时段的主要诗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并用现代诗学观对它进行再审视。参加本丛书撰写的有 12 人,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无法求得完全一致。为了不致于在大的原则上自相矛盾,我要求同仁在著述中贯彻下列观点:1. 诗必须首先是诗,诗学必须首先是诗之学,不能用任何别的“学”取代它、削弱它;2. 诗固然要表现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再现,日常生活中的情与诗情,一般的“意”与诗意,一般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等等,都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其分界线在“诗化”,前者未经“诗化”,严格说来,还在诗的宫墙之外;3. 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二者的创新与发展;4. 作为诗学,不能不触及内容与形



式的关系问题,我不主张机械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二者在具体作品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表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果在理论上对二者有偏至,都会产生消极后果,故不主张硬性地分为第一、第二,而持并重论;5. 每个时间段的诗学都往往有多家多派,我不主张以某家某派为圭臬,去要求各家各派,而期望俯视各家各派,既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因为各个流派互有短长优劣,少有一无可取者,也无十全十美者;6. 鉴于曾有忽视诗艺的偏向,我力主向这一方面倾斜……凡此种种,有的作者坚持自己的见解,我也不作强求,因为可能这种“坚持”,恰恰是书中的精粹所在。有的著作者放弃了或修正了原来的己见,迁就我持的观念,如果我这些看法有误和因我的失误而导致损害了专著的质量,则是我的过失和罪责。

总 序

所有参与《丛书》撰稿者主观上都追求著作史料准确可靠、充实,论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诗学核心理论问题分析细致深入,有理论高度和深度,著作在整体上有较高学术水平,每一卷至少有若干章有著者的独到之见。凡借用已有成果处,一定加注说明,以免掠美。撰稿者和我虽竭尽全力,但因学识所限,加之时间紧迫,故每一本书,并非处处精彩,一是留下了明显的遗憾,如《宋代诗学》对词学理论未作专门论析,即是一例;二是个别处所难免存在谬误,恳请读者和方家指正。至于学术观点的歧异,我想,今天的学者当会视为正常现象。

本丛书的每一部书稿,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为了避免个人偏见和疏忽,还请几位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分别审读部分书稿,《先秦两汉诗学》是尚永亮教授,《魏晋南北朝诗学》是王启兴教授,《唐代诗学》是李中华教授,《宋代诗学》、《清代诗学》、《近代诗学》是陈文新教授,《明代诗学》是郑传寅教授。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劳绩。

这套丛书的出版,应该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他们出于对学术事业的热忱和远见,对这一课题特

别重视,他们是《丛书》的催生人,对《丛书》的出版始终给予全力支持;应该感谢为《丛书》撰稿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和协助我工作的同志们;感谢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负责同志,他们给了不少助力。我深深体会到:每本书虽是著者的成果,但也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劳动结晶。

陆耀东

2000年11月15日

总 序	陆耀东 (1)
导 论	(1)
一、现代诗学的历史转换	(3)
二、当代诗学的发展态势	(12)
三、当代诗学的表现形式	(22)

上编 古典与民间诗学的复兴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诗学

第一章	诗歌创作的转换和诗学理论 的嬗变——50至60年代诗学的创 作背景和发展概况.....	(31)
第二章	核心理念:在古典与民歌的基 础上发展新诗——毛泽东的诗学 思想及其理论影响	(50)
第三章	回归传统:对新诗格律的再 度探索——新诗形式讨论中的诗学 问题	(70)
第四章	走向民间:对民间诗歌的极度 推崇——新民歌讨论中的诗学问题 ...	(103)

下编 “现代”与“后现代”诗学的崛起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诗学

第一章	诗歌创作的复甦和诗学问题
-----	--------------

的凸现——70至80年代诗学的创作背景和发展概况 (127)

第二章 核心理念：艺术革新和诗歌的
现代化——70至80年代诗学的焦点
问题和主导倾向 (148)

第三章 重塑诗魂：对新的美学原则的
追寻——新潮诗歌的诗学问题 (169)

第四章 再造诗心：对生命存在之诗的
体认——后新潮诗歌的诗学问题 ... (207)

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238)

导 论

导 论

提到当代诗学,读者定会发问,当代是否有诗学存在?提出这个问题,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整个当代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一种极端政治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的存在,一切文学样式皆成了政治的工具,诗歌也不例外。既然如此,诗也就如一切文学样式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本性。本性既失,又何来研究诗的本性的诗学可言?其次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反差极大的旅程:17年诗歌逐渐走上一条极端政治化的道路,到“文革”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结束以后的诗歌首先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开始,尔后又出现了一种远离政治的个人化(“表现自我”)倾向,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自我反叛的历程,前后又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又怎么能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一个统一的诗学理论?再次是中国自古以来似乎就少有成体系的诗学理论,历代留下来的一些诗话词话大都是一些散金碎玉自不必说,就是经过革命以后的新诗,迄今为止,似乎也未见有一部成体系的诗学论著。有鉴于此,怀疑当代是否有诗学存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即使是在极端政治化的17年,也仍然有人在思考诗歌问题,而且为着政治的需要,还集中讨论过一些重要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问题。在这些思考和讨论中,就孕育了当代诗学的萌芽因素。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新





时期，17年的诗学理论虽然在新时期遭到了新潮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颠覆，但在这个前提下建构起来的一种诗学理论，相对于17年的诗学理论来说，只能说是另一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不能因此就否定17年诗学的客观存在。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当代诗学才显得更有张力，更丰富多彩。至于诗学理论的成体系与否，似乎更多地是一个中西理论思维的差异问题，不能据此以西方体系化的诗学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当代是否有诗学存在。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成体系的诗学，也不认为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散金碎玉就是诗学的一种完善的形态。我的意思只在说明，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也有各自对于诗歌问题（包括其他文学问题）的观照方式，因而一个民族也就有各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诗学。而且，诗的问题也如其他精神文化现象一样，还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对诗的问题的思考也就不能不打上这些方面的深刻烙印。因此各民族的诗学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千差万别的表现形态。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诗学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问题。

本书把当代诗学定位在当代人对于当代诗歌的思考方面，认为当代诗学是当代人对当代诗歌问题思考、探索的理论结晶。这些思考、探索不论是散金碎玉还是自成体系，都是当代诗学的基本内容。既然如此，研究当代诗学，首先就必须找出哪些问题是当代人关注的诗学问题？它何以会成为一个诗学问题？当代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怎样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又呈现出怎样的表现形态？以及我们今天该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凡此种种，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从这些问题出发，来搜集、整理（同时也是阐释、评价）当代人对于当代诗歌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为了从总体上把握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发展演变情况，本书在“导论”部分又从这些问题的历史



联系和现实表现的角度,分述其若干特征,以求最后给予读者的是一个有关当代诗学的完整印象。

一、现代诗学的历史转换

研究当代文学问题,总离不开一个历史的前提,即它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研究当代诗学问题,同样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五四文学革命是从诗歌领域率先开始的。这场“诗国革命”(胡适语)在尝试白话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诗学的革命。胡适等人在海外讨论诗歌革命和文学革命问题时,就涉及到了许多诗学问题,例如诗歌的形式(诗体)是在不断革命的,旧的形式不能容纳新的内容;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死的文字不能创造活的文学等。这些新锐言论,无疑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赖以存在的语言基础和它创造的独特的美感形式,从根本上进行了一次釜底抽薪式的颠覆。这种颠覆行动同时也是诗学领域发生革命的先声和信号。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旧文学的文统和道统进行全面清算的同时,也对中国古典诗学(尤其是格律诗学)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虽然这期间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有对古典诗学资源的点化和利用(例如“以文为诗”和双声叠韵的理论等),但从总体上说,却是以革命为首要之务的。经过了这场革命,中国古典诗学无论是“诗教”的观念还是涉及具体创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论,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或虽未实施正面攻击,却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起来。在“悬置”和颠覆了古典诗学之后,白话新诗在大胆尝试的同时,也开始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探索。对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也就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最初萌芽。从近代“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短短20年间,从创作到理论,都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这个时候起,中国



现代诗歌在不停顿的艺术追求的过程中，也开始了诗学的理论建构。

就整个 20 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和发展而言，虽然由于它自身的演变和所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在不同的时期都要面对一些不同的问题，因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但是，20 世纪中国现代诗学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以向现代转型为起点的，因而诗学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20 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尽管在不同的阶段上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经历过纷纭繁复的变化，但最终的指向都不能不是这个关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价值目标，都不能不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对诸多创作问题和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索和思考。当代诗学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总体趋向上，当代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历史联系，并以它自己的独特追求方式和独特的表现形态，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当代诗学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诗学的萌芽阶段，是以对传统诗学的“革命”为起点的，虽然它从根本上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的理论资源，却不再是中国诗歌两千多年来所积累的思想资料、所建构的诗学体系，而是西方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诗学理论，当然也包括作为这期间西方诗学理论的直接渊源和历史传承的整个西方诗学传统。正因为如此，从五四时期直到 40 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主流是追求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尤其是西方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诗学和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诗学，更是这期间的诗人和诗论家创造各派诗学所取法和心仪的对象。虽然这期间的诗学在某些时候也因为与逐渐成为主流的革命文学的观念和趣味不合，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屡遭诟病，但从总体上说，却集中体现了这期间诗歌的艺术探索和理论反省的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崇尚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以早期新月派

为代表的讲求艺术规范的格律诗学，以早期象征派、现代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等，更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这期间的诗学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建构各派诗学的过程中，也相对忽视了对本土诗学资源的取用，尤其是在一些现代主义诗学派别的理论中，本土的诗学资源显得更加贫弱、匮乏。这样，这期间的诗学在建构一种新的诗歌理论的同时，更加远离了民族的诗学传统。这种背离民族诗学传统的倾向，在这期间的诗学内部也引起了一种理论上的反拨，由这种反拨所引发的本土化倾向，也就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发生历史性转换的一股内在推动力量。

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现代诗学在它的草创阶段，虽然以一种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向古典诗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由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对西方现代诗学的引进还不够深入系统，这期间的诗学又常常在有意无意地向传统诗学吸取滋养。例如胡适最早提出的诗歌革命的主张——“要须作诗如作文”，从诗学渊源上说，就可以从近代“宋诗派”的诗学上溯到“以文为诗”的首倡者韩愈以降的理论影响。胡适鼓吹诗歌革命和尝试白话诗，也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取得了理论支持。至于五四时期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自然”诗观，固然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但与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诗学崇尚自然的传统，显然也不无关系。甚至连对西方最新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及早期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所作的阐释，也不得不借助和依托中国古代的诗学资源。朱自清说“象征”是“远取譬”、周作人把象征与“兴”的手法联系起来，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更不用说诸如“诗言志”等有关诗的抒情本质的理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等有关诗的现实精神的理论，“为歌生民病”等有关诗的人间关怀的理论，以及诗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和诗的意境或境界的理论等等，都被五四及其后的一些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用来阐释从西方接受过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和诗歌中的人道主